

# “历史”与“科学”

王 学 典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 C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1-4721(2000)03-0010-03

自从 20 世纪初文、史、哲诸人文学科从传统学术框架中独立出来之后,人文研究就受到来自“科学主义”的影响与冲击。不过,稍为留意即可看出,在众多人文学科中,数历史学的科学化冲动最为强烈、“科学焦虑”最为深重。譬如,在学坛上,“文学科学”或“文艺科学”与“哲学科学”等提法甚为罕见,而“历史科学”一词则成为流行的对历史学的尊称。历史学在整个 20 世纪,可以说都处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之中。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以下两个方面:1. 这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确定性的渴望。就其本意来说,“历史”应该说是“真实”的代名词,它应该像科学知识那样确定、那样令人敬畏。但在实际上,历史知识是一种价值知识,极其不确定。如所周知,仅在 20 世纪,孔子的形象就不但“因时而异”,而且还“因人而异”,即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最普通一例。历史知识越不确定,人们、特别是史家就越渴望它趋于确定。2. 历史学本质上属人文学科,但在任何意义上都具有不能轻忽的科学属性。历史学的科学属性首先在于它能向世人提供许多确凿无疑的判断:毛泽东出生在 1893 年 12 月 26 日,逝世于 1976 年 9 月 9 日;“西安事变”发生在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可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并不满足于获知这些所谓可靠的判断。人们希望历史学家在更广阔的问题上发表意见:毛泽东的功过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安事变”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命运……。这就把“历史”从实证的层面推到了阐释的层面,从理性的层面推到了价值的层面,从确定性的层面推到了非确定性的层面。更进一步地说,从科学的层面推到了人文的层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把历史学划入人文的范畴。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就可以摆脱科学的约束,对历史随心所欲地进行阐释。事实上,正是从阐释所包含的信息量和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的相关度上,人们能看出一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与一个拙劣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别。而人们持以判断这种差别的,正是是否科学、是否客观这样的尺度。

“科学”、“真实”和“客观”,对历史学来说,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科学精神”在历史学领域集中体现为“客观”的态度,也就是“价值无涉”的理论立场。这种立场和追求也自然来自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客观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胜任的科学家从同样的证据出发,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或结论可以被科学界或同行普遍接受。(参见[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5 页)以“普遍同意”、

收稿日期:1999-12-30

作者简介:王学典(1956-),男,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普遍认可”、“普遍接受”为内涵的“客观性”，在历史诠释的层面上，贯彻起来是很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历史诠释者都希望看到他的诠释被尽可能多的人接受。因此，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在实践的意义上，只是一个程度概念，只具有量的属性，换句话说，只是一个比重、分量问题。历史学中的“客观性”的实现，只是在一种弱化了、次要的意义上仍是可能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相信谁能写出终极的历史。可是，不能不看到，有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要比其他一些历史经久一些，具有较多的终极的性质。这些“具有较多的终极性质”的历史，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的历史”。

要探讨怎样才能写出“客观的历史”，看来必须首先明了导致历史阐释非客观的种种因素。导致历史阐释非客观的因素虽然有许多，但这些因素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类：1. 个人的好恶；2. 集体的偏见（主要指与历史学家所属的某一集团的身份相联系着的假设，如民族主义信念、阶级立场、党派政见、宗教情感等）；3. 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学理（如信奉经济因素能对历史提供最终解释的唯物史观和拒绝把任何单一的因果关系因素看作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所谓“秃头史观”等）；4. 根本上的哲学对立即人们所持有的不同道德和形而上学前提假设（如人性的善恶、人类正义、社会公平、进化主义等等）（参见上书，第100-104页）。上面所揭示的导致历史阐释非客观的四种因素，可能会让人们看到，研究主体的个人气质、角色背景、理论倾向、哲学假设等，对主体的干扰是如此强烈，以致使史家很难做到纯客观、纯科学。但这种限制的存在并不能构成放弃对纯客观境界追求的理由。事实上，如果历史学家细心，是可以争取做到尽可能客观的。这种所谓的“细心”包括：要自觉地努力意识到自己的偏好，从而在阐释历史的过程中排除它们；要自觉地努力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带有相对性，从而防止得出过于偏颇的结论；要倾力采集各种历史资料，特别不能对不符合自己所偏爱的观点的资料置之不顾等等。历史学家不可能全部完成上述努力，而且即使完成上述努力，有些偏见仍然难以根除。材料永远残缺的限制和观察地位的局限，亦构成许多偏见得以滋生的源泉。但是，如果历史学中的“客观性”仅仅指史家对“偏见”的自觉程度和“价值中立”的程度，我想这种“客观性”还是有可能达到的。

从“客观性”所能实现的程度来看，上所列的四类导致非客观的因素应该倒过来观察。如果能提供一套所有历史学家都能接受的标准价值观念或大家在关于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上一致，就能在历史学领域实现绝对客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现在看，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退而求其次，如果历史学家能够持有相同的历史理论，也能达到相当的“客观”。老实说，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一种历史理论足以征服所有的人，使人们自觉信奉，而历史学家是不能没有“理论”的，如果他要使他的“事实”有任何意义的话。在历史理论的多元并存格局下，是谈不上什么“客观性”的。其三，超越民族、宗教、阶级和党派的集团假设，历史学就能做到相对客观。其四，摆脱个人偏好，历史学就能实现初步客观、说得过去的客观。

目前并没有人要求那种绝对的客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是绝对的虚妄。同样，如果有人因为历史学不能达到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就干脆倾向学术上的无政府主义，也同样是绝对的虚妄。在现阶段，根除明显的个人偏好，进而消除党派、政见、宗教和民族的局限，——超越“集体的偏见”，可能就是社会公众对历史学家

们所要求的“客观性”。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有可能。据说，德国的兰克就做到了这一点。兰克把历史看成是伟大的政治观念与伟大的宗教观念之间永恒的冲突。为了观看这种冲突的真正面貌，他不得不研究这部历史剧中的所有党派和所有角色，而且在从事这种研究时不含有好恶感或党派偏见，同时容纳朋友和敌人。他的博大胸怀能够包容所有时代所有民族，他能够以同样公正而不带民族偏见的精神撰写教皇史和宗教改革史、法国史和英国史。兰克也有倾向性，即同情心，但兰克的同情心是真正历史学家的同情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同情心，他的同情并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并不包含对个别行动的任何褒贬。世界历史就是末日的审判。兰克认为，在世界历史的伟大审判中，历史学家必须为判决作准备而不是提前宣布判决。这远远不是道德中立；恰恰相反，它是最高的道德责任感。根据兰克的想法，历史学家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如果他要作为一个法官发言，那也只是作为预审法官来说话的。他必须收集这桩公案中的一切文献以便把它们提交给最高法院——世界历史。如果他在这个任务上失败了，如果由于党派的好恶成见他隐瞒或篡改了一点点证据，那么他就玩忽了他的最高职责（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240页）。从兰克的史学实践上看，写出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浓厚的与宣传品相区别的、相对客观的历史，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是可能的。

为了使“历史”尽可能“客观”，有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主张躲避、逃避“现在”，以为在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里才有所谓“客观”。这其实是误解、而且是很深的误解。事实上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客观性”，不仅不是一种与“现在”无关的“客观性”，而且也不是一种与“将来”无关的“客观性”，联系“现在”，联系“将来”研究“历史”，才有所谓的“客观性”。“历史学家不是过去事件的编纂者，而是过去事件的解释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成功地在自己与过去之间找到恰当的位置。”“历史学家不仅不应为防止心灵的粗鲁污染而躲避现在。而且应该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止境的、复杂微秒的、变化多端的关系始终不渝地作出反响。要保证读者免于接受曲解的历史；不是要历史学家将现在流放他处，而是要历史学家将他的论点谨慎地限制在他的证据能够支撑的范围之内。”（〔英〕约翰·坎农著、薛刚译：《历史学家在工作》，《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6期）历史是“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对话。只有在面向过去、现在的同时面向未来，才有历史学的根本的客观性可言。“世界历史是末日的审判”。只有面向未来，历史学家才能超越自己所在的社会以及所在的历史之中的地位所给定的局限，——认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被卷进了“现在”之中，然后他才能具备一种“更深入的、更持久的对于过去的洞察力，这比那些把观点完全束缚在自己当前地位的历史学家们所能得到的，要深入、持久得多。……理解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理解将来的目标前进时，才能达到客观性”（〔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5页）。真正的历史、具有较多客观性质的历史，看来只有由在历史本身中找到了一种方向感、并且接受了这种方向感的人来写。

〔责任编辑 陈绍燕〕